

左宗棠全集

奏稿一

左宗棠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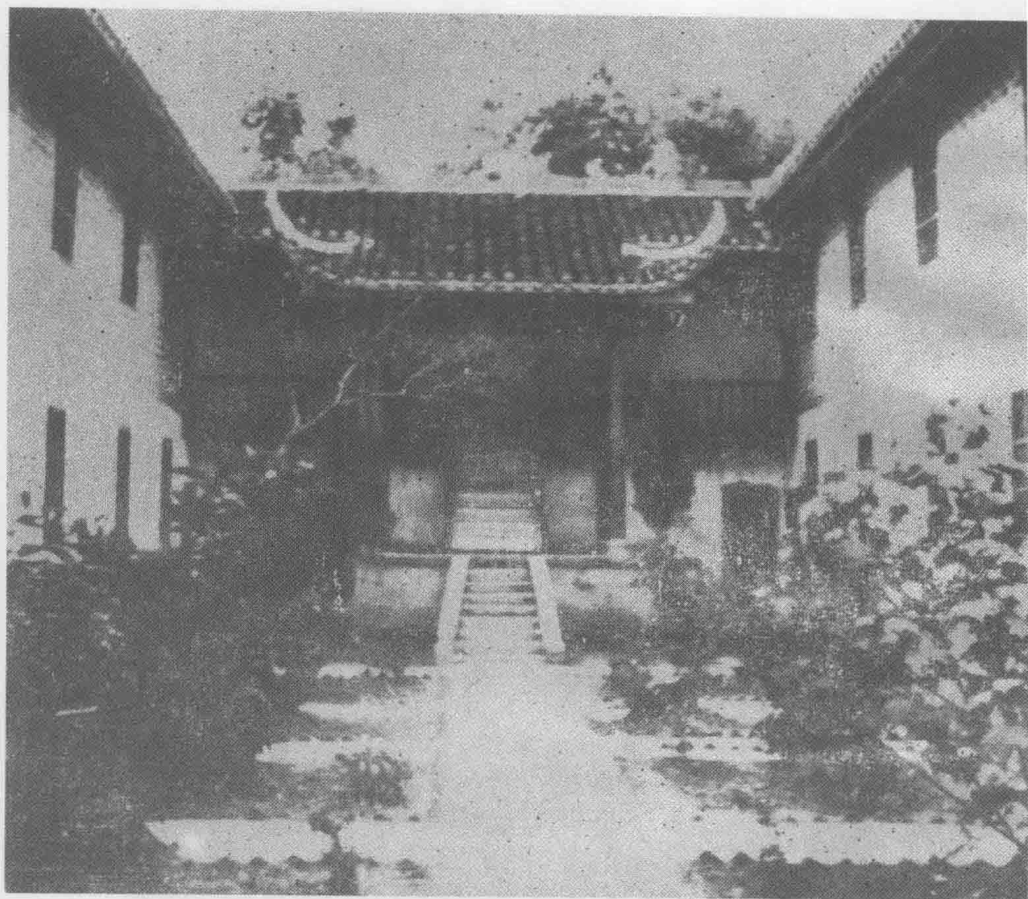
奏稿一

岳麓書社·長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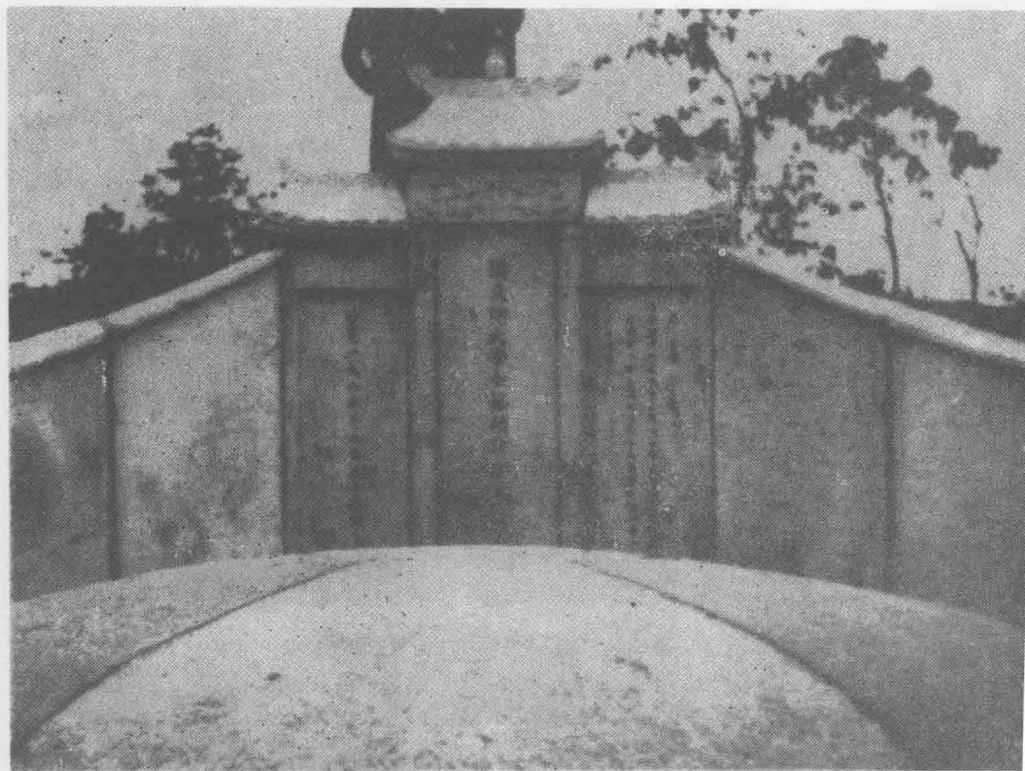
贈太傅原任東閣大學士二等恪靖侯諡文襄左宗棠



左宗棠画像



湘阴县左家墩左太傅祠



长沙县白竹塘左宗棠墓(一九八五年重修)

(湖南地理文丛·岳麓山) 岳麓山左宗棠墓

奏為特委交代短欠虛列款之知縣請暫行革職等因欽此

聖鑒事竊照州縣倉庫錢糧雜稅均關

甘肅如遲任卸應照例限按款交收清楚不容稍有短欠前因密成米復案雖係期清理經前代判布政使事沈嘉湖通詳式敬查明先後以便暨完善各縣行令查照應任交代定章由府委有監監督算期限兩個月交收造報在案茲查有署秦州縣知縣左兆龍應接前署秦州縣知縣顧誠交代經溫州府知府周開錫督飭監盤小縣縣知縣陳寶善會同逐加核算該署顧誠銀短欠銀米穀石共合銀六千餘兩竟敢虛列抵款延不交解現銀當此地方和復力奉督飭以此取巧飾宥若不立予示懲何以昭炯戒而重文盤據該管府道詳由藩司轉送謹轉請奏奉前來除飭兩縣遵並再督飭監盤後任確查顧誠有無虧欠別款另行辦理外相應請

古將前署秦州縣分缺先用知縣顧誠暫行革職仍

勒令全數交解清楚如能俟限滿清即當另請

開復懷再不知愧奮仍前延欠或查有虧欠別

款亦即從嚴奉辦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議政王軍機大臣奉

旨顧誠著暫行革職勒令全數交解清楚是係以前

延宕及查有虧欠別款即行從嚴奉辦欽此

同治三年四月 二十 日

前言

左宗棠（1812—1885）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十分重要而又极其复杂的人物。他比曾国藩仅小2岁，与曾同时而齐名，都是清末湘军首领，共同镇压过太平军和捻军；又都是清末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力行者。而他比曾国藩晚逝世13年，较曾进行了更多的历史活动：先是领军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继之大举督师西征，歼灭入侵新疆达15年并获得英、俄等国支持的西亚浩罕汗国阿古柏匪帮，收复祖国辽阔领土新疆，并促成新疆建省，推进西部开发；最后入值军机、总督两江、督办福建军务，病歿于抗法前线。他是一位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人物。

自左宗棠逝世后的百餘年来，人们对他的生平和思想，对他的历史功过，对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断断续续作过一些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是认识仍很不一致，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为了给左宗棠研究提供尽可能充分、可信的第一手资料，也为了及时整理和积累地方文献，推进湖湘文化研究，岳麓书社于1983至1996年间，集省内一批专家学者，费13年之功，陆续整理出版了15卷本、逾800万字的《左宗棠全集》。如今，又为适应左宗棠研究和湖湘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需求，湖南省重大文化工程《湖湘文库》将《左宗棠全集》修订收入该文库。这无疑是学术文化界的一件大好事。值此机会，我想就以下三个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以就正于左宗棠

研究者和广大读者。

一、关于左宗棠研究和评价的历史回顾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几经变迁，人们对左宗棠的研究和评价也经历了富于戏剧性的反复曲折的历程。

2 在清末，就清官方和封建文人来说，左宗棠当然是对清王朝功勋卓著的“中兴名臣”，备受赞扬和崇敬。清政府在多次上谕和御赐祭文中，极称其“学问优长，经济闳远，秉性廉正，莅事忠诚”，生平事功“扬历中外”，为“一代之伟人”，“生为社稷之臣，没壮河山之色”，等等。左宗棠还在世时，王闿运就在所撰《湘军志》中，对他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活动多所夸饰。左宗棠去世后，王定安写《湘军记》，曾毓瑜撰《征西纪略》，罗正钧编《左文襄公年谱》，易孔昭等编《平定关陇纪略》，魏光燾著《戡定新疆记》，等等，都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为左宗棠铺张事功，树碑立传的。

与此相反，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人，则对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扶持清王朝“中兴”的左宗棠，深恶痛绝，尽情予以鞭挞和贬斥。湘籍民主革命家杨毓麟，在所著《新湖南》一书中，责骂左宗棠与曾国藩等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是“忝窃节钺，算入满汉名臣功绩传之混账糊涂簿籍中，实湖南之大不幸”。《民报》临时增刊《天讨》上，以“过去汉奸之变相”为题，刊登一幅曾、李（鸿章）、左的漫画，三人皆系人面兽身，其中左宗棠为狗身。当然，其中也不乏冷静客观的学者。如章太炎在指责左宗棠“为虏将兵，以敌洪氏”的同时，就称赞左治军严谨而富谋略，“士卒有创伤平民者，必诛无贷”，“他那出奇制胜的方略，毕竟令人

佩服”。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左宗棠被冷落了整整20年。

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左宗棠却又引起研究者们浓厚的兴趣和关注，发表、出版了一批论文和专著，形成了左宗棠研究历史上的第一个热潮。这些论文和专著，就其基本观点来说，可以说同清末官方的观点没有多少区别，即对左宗棠对外反抗侵略、对内镇压起义两方面都予以全面肯定；但也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突出强调左宗棠反抗侵略、建设国防的“边功”。这一引人注目的情况，显然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总形势密切相关。如这个时期发表的第一篇有关左宗棠的论文——1932年姚欣安发表于《西北研究》第3期的《清末新疆政策底史的发展》，写道：“回忆清末时代新疆之危机，能不令人感到左宗棠之可钦乎？鄙人草此文之目的，亦在所以表彰民族之功臣，而不愿使之遗恨九泉也。”1935年，《边铎》第2卷第1期发表方骥《左宗棠治理新疆政策之研究》一文时，编者在按语中写道：“作者因感于‘九一八’事变，深惧国防之可忧，故草斯文。”继后，陈其田著《左宗棠：中国现代造船厂和毛纺厂的开拓者》（英文版，1938年），从一个侧面论述了左宗棠的洋务“自强”活动；秦翰才著《左文襄公在西北》，其“旨趣”之一是“表彰左公经营西北的功业”；卢凤阁撰《左文襄征西史略》，系统扼要地记述了左宗棠督师“西征”，特别是收复新疆的全过程；戴慕贞著的《左宗棠评传》和张振佩著的《左宗棠》两书，重点也放在以上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约30年间，由于存在着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倾向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学术界对左宗棠的评价是否定的或基本否定

的，研究的人员较少，发表、出版的论著也不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发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进一步贯彻，左宗棠研究迅速出现了复苏的局面，并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研究者队伍逐步壮大，成果空前增多，争鸣气氛较浓，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不断有所拓展。截至2000年即上世纪末，22年间，先后发表论文290余篇，出版专著10部。这些论著，与前一时期不同，大都对左宗棠作了肯定的或基本肯定的评价，特别是突出宣扬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高度评价他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以及他举办“洋务”的爱国、进步作用。其中，杜经国著的《左宗棠与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系统地记述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建设新疆的全过程和历史功绩，提出：左宗棠同曾国藩、李鸿章有区别，“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董蔡时著的《左宗棠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采用历史比较方法评价左宗棠，认为：“李鸿章是投降派的罪魁，左宗棠是爱国派的首领”；“左宗棠继承和发扬了林则徐的爱国主义精神……就反侵略斗争的功业、对祖国的贡献而论，则远远超过了林则徐”。杨栋梁著的《左宗棠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评述内容较为全面，对左宗棠参与镇压太平军、西捻军和统兵镇压陕甘回军都有专章论述，高度赞扬左宗棠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王天奖著的《左宗棠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充分肯定左宗棠“在对待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这个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矛盾上，他的态度一贯是坚定和鲜明的……不愧为近代中国统治阶级中一个难能可贵的和功勋卓著的爱国者。这是左宗棠这个历史人物主要的一面”；同时也指出，他“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个忠实代表”，在处置国内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上的局限性。左

宗棠的后裔左景伊著的《左宗棠传》（长春出版社，1994年；华夏出版社，1997年），写得很有特色，高度赞誉左宗棠为“民族英雄”，认为“他的一生贯串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方面和外国侵略者，一方面和国内的投降派，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的经历”。孙占元著的《左宗棠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一种，除概述左宗棠的生平外，还分章对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洋务、外交、军事思想进行了论述，认为：“如果把其生平与思想置于时代变迁的发展脉络中加以认识，那就可以得出初步印记：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以促进中国的近代化，是其功绩；站在人民起义的对立面，维护与拯救清王朝统治的举措，是其过失。”安静波著的《左宗棠》（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认为左宗棠兼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深厚的民本主义”，是“新旧矛盾交织、中西文化早期融合中的过渡人物”，他既是“铁骨铮铮的民族英雄”、“励精图治，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者”，又“血腥屠杀敢于造反的民众，犯下了严重的历史罪过”。其余三部专著，是皮明勇的《左宗棠》（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左氏又一后裔左焕奎的《左宗棠略传》（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初版，1996年增订），李晓峰的《左宗棠——忠介人生》（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均写得较为单薄，也都大体上肯定左宗棠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者或民族英雄。但是，在这一阶段，争论仍然存在，不同观点逐步展开。如对左宗棠的总评价，绝大多数人赞誉左宗棠为“杰出的爱国者”，甚至是“民族英雄”，而有些人则认为“不宜将左宗棠评价太高”，甚或认为只能说其有“爱国的行为”。对其他许多具体问题，如关于左宗棠对陕甘回军的镇压，关于“海防”与“塞防”

之争，关于左宗棠的洋务思想和洋务活动，关于左宗棠与太平军的关系，以及关于“借洋助剿”问题等，也都存在不同意见。

进入新世纪后，左宗棠研究趋热的势头仍在继续。据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编制的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在2001至2007年的短短7年中，先后出版有关左宗棠的专著5部，发表研究论文29篇。这些专著依次为：刘华明、郑长兴主编《左宗棠全传》（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年），袁宁著《左宗棠传》（京华出版社，2002年），沈传经、刘泱泱著《左宗棠传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夏味著《悍将左宗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马啸著《左宗棠在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因时间较近，有些书尚未阅读，各著作的内容、观点，不能臆断，只能留待以后评析。

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汉奸，爱国者；卖国贼，民族英雄；反动派，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屠夫、刽子手，为人民作过好事；等等。由于受不同指导思想、方法论、情感偏向的影响，一个人的历史命运竟是这样的大起大落，人们对他的评价又是如此地截然相反。

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研究历史，当然可以而且应该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但是，这种服务，主要应表现在尊重历史的客观实际，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及积累知识、增长智慧等方面，而绝不能伪造历史，颠倒历史，或者从丰富多彩的历史活动中，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资料中，各取所需，曲解历史。以伪造和曲解历史的办法来谋求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不仅糟蹋了历史学，也是对现实政治的嘲弄。历史，作为过去的现实，本身是客观的，不以人们主观意志或思想感情为转移；又是固定化了的，不容后人随意改变，改变了

就不成其为真实的历史了。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它的最高原则是实事求是，来不得半点矫揉造作、感情用事和主观随意性。这是我们在研究和评价任何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时，必须牢牢记取的。评价左宗棠也不例外。

二、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评价左宗棠

根据实事求是的总体要求，我们认为，要正确评价左宗棠，从具体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上，有三点是必须明确和坚持的：首先，必须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历史人物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并在一定历史时代中发挥作用。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应当把他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考察，而不能用现代所要求的東西去苛求古人。评价左宗棠，必须紧密结合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条件，考察他对当时社会各项重大事件的态度和作为，具体地如实地分析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第二，必须坚持全面分析的原则。社会历史条件是复杂的，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活动也是复杂的：既有各个阶段的发展变化，又有各个方面的不同表现。评价左宗棠，不能片面强调其中任何一个阶段、一个方面，而置其他阶段、方面于不顾。必须全面分析，多方考察，才不致失之偏颇。第三，必须坚持看主流、看发展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在社会诸种矛盾中，必有一种为主要矛盾。社会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由于主要矛盾的发展，各个历史阶段常表现出一定的发展趋向和社会潮流。一个人的一生也有其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的方面，并表现出基本的发展趋势。评价左宗棠，不仅要全面分析其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的表现，尤其要找出其中的主流方面和发展趋势，考察他在中国近代社会主

要矛盾发展中表现和作用，看他是否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

下面，就让我们根据这些原则，对左宗棠的一生作些综合的考察，以便作出较为实事求是的全面公允的评价。

左宗棠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急剧转变的风雷激荡的时代。在他生活的 70 余年中，国家发生发展着六个方面的重大社会变迁，即：一、封建经济的危机。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末世。主要标志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逐步破坏着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为特征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基础；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二、清王朝的衰败。经济凋敝，流民问题日益严重，吏治军政腐败，仕风日下。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继 1796—1804 年川楚白莲教大起义之后，1813 年河南、直隶林清与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起义者曾一度潜入北京，袭击皇宫，全国震动。在左宗棠的家乡湖南，以天地会为代表反清斗争日趋频繁：1832 年东安等地瑶民赵金龙起义，1836 年新宁等地蓝正樽起义，1844 年末阳大鹏起义，1847 年新宁瑶民雷再浩起义，1849 年新宁李元发起义。随后便是 1851 年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爆发，迅速席卷大半个中国，各地人民起义特别是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起义亦风起云涌，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四、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开初，资本主义列强的工业品受到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和清王朝闭关政策的顽强抗拒，于是它们便无耻地向中国输入另一种特殊商品——鸦片烟毒，严重地危及清王朝的两大支柱——军队和财源；当清王朝决心禁烟时，它们便公然诉诸武力，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终左宗棠逝世之年，西方列强先后向中国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即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同时，

沙俄逐步蚕食和强占我国东北、西北大片领土，英、俄支持的西亚浩罕汗国阿古柏匪帮又侵入我国新疆。国家四境告急，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五、社会思潮的转向。原先长期统治中国思想界的宋学和汉学已日趋空虚和烦琐，严重脱离实际，无补时艰。不少士子力图在学术上寻找新的出路，高举起了“经世致用”的旗帜。他们猛烈抨击宋学的空虚和汉学的烦琐，深刻揭露封建末世的黑暗和清王朝的腐败，热切提倡政治与经济改革，积极从事边疆史地和世界史地研究，坚决主张抵抗外来侵略，同时开始呼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股劲势的“经世致用”思潮，成为其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化演进的一个思想中介。六、洋务运动的兴起。在国家内忧外患的刺激下，在经世致用思潮的推动下，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某些分化：一部分人继续抱残守缺，抗拒任何改革，成为顽固派；另一部分人则适应时局的变化，主张举办“洋务”，学习西方国家某些长处以求“自救”，史称“洋务派”。在“洋务派”官僚的影响、推动或主持下，开展了长达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开初主要是以“自强”为标榜的练兵制器活动，创办了许多军事企业；继后则在“求富”的旗号下，重点转向兴办民用的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洋务运动”的主旨虽在挽救腐朽没落的清王朝，但在客观上却启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面对当时的这些重大社会变迁或重大历史事件，左宗棠的态度怎样？他是如何作为的？结果又如何？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切实把握的。通过对左宗棠的生平和思想的全面了解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相应的图景：首先，左宗棠在经济思想上，重农而不轻商，他主张“护商”、“利商”，保护和发展商品经济，特别是在晚年，主张商办厂矿企业，扶持私人资本，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左宗棠对清王朝政治的腐败不满，任职期

间，所至之处，大力整饬军政、吏治，反腐倡廉，除弊兴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和压迫。第三，左宗棠中年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西捻军，随后又统兵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在这方面，他对人民是有罪的。但是他镇压人民起义，经历了一个由帮凶到祸首、官职和影响由小到大的过程，其地位和作用同曾国藩有所区别；同时，他虽然镇压人民起义是坚决的，而善后安抚工作又是卓有成效的，在赈济抚恤、敦教劝学、恢复和发展生产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第四，左宗棠一贯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毕生致力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早年就关注国事，在鸦片战争期间为反侵略战争筹谋；继后挥戈西征，经武东南，塞防、海防并重，始终与侵略者相周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特别是他督师西征，讨伐英、俄支持的浩罕入侵者阿古柏匪帮，并以武力支持对俄伊犁谈判，收复新疆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失地，为国家民族立下了千秋不朽的功业。第五，左宗棠早年深受贺长龄兄弟、陶澍、林则徐、魏源等的思想影响，是“经世致用”思潮的崇奉者，他饱读“有用之书”，特别在舆地学、兵学、农学以及洋务之学等方面有着较深的造诣，为他往后外抗侵略、内事建设作了学识上的准备。第六，左宗棠是清末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者之一，建树颇多，影响深远。他在洋务运动中独树一帜，主要着眼于“策富强之效”，抵抗外来侵略，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主张“官办开其先，商办承其后”。总之，左宗棠在上述六个方面中，镇压农民起义，扮演了历史的反面角色，但是在发展经济、整饬吏治、抵抗侵略、端正学风、举办洋务等诸多方面，则都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并卓有贡献。他显然不同于当时一般顽固守旧的官僚，不失为当时统治集团中较有远见的人物，是地主阶级中颇有作为的爱国者，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起过不容低估的积

极作用。

左宗棠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活动的时间较长。他一生度过了73年。如果自1852年（咸丰二年）进入湖南巡抚幕府算起，他的政治生涯也有33年。他确是由镇压人民起义起家的。从1852年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开始，到1873年统兵平定陕甘回民起义止，他镇压人民起义共经历了21年，占了他全部政治活动时间的将近三分之二，罪过不能不说是严重的。这正是不少论者否定左宗棠的主要原因和主要依据。但是，左宗棠一生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不仅仅在镇压人民起义。大体说来，左宗棠一生的活动，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一、镇压人民起义；二、反抗侵略、收复新疆；三、举办洋务；四、表现于除弊兴利、整饬吏治、处理善后、新疆建省、台湾改制等的政治社会改革。左宗棠镇压人民起义的时间虽长，但反抗侵略更是贯彻了他生平事业的始终。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他尚无一官半职，不过是一个僻处山乡的私塾教师，就已经在为抗英战争筹谋了。即使在镇压人民起义期间，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在天津教案交涉时，他也是坚持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尔后，他督师西征，讨伐入侵的阿古柏匪帮，收复新疆失地，功勋卓著。晚年南下抗法，反对妥协议和，临终仍以未能对侵略者“大伸挞伐，张我国威”为憾。左宗棠举办洋务和进行各项政治社会改革，既贯穿于镇压人民起义的过程中，而又远远延伸于镇压人民起义之后。在临终《遗折》中，他还关心“海军”及“铁路、矿务、船炮各政”，以“策富强之效”。尤希望最高统治者努力学习，勤理政事；“日近正人，广纳谏论”；整理财政，以“充军食”、“济时艰”；“上下一心，实事求是”。他所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兰州织呢总局等军事、民用企业，有益于国计民生，有益于国家经济、军事、社会的近代化。他大